

# “术”高于“学”

## ——对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点反思

任卫东

(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,上海 200241)

**摘要** 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名词的学术二字,其本意各有所指。大抵学指学理,而术则重在应用。近代以来,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,更重视西方的技术应用,而对于技术背后的学理探究则较为忽略,形成了一种重“术”轻“学”、“术”高于“学”的情形。

**关键词** 学 术 学理 应用

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:1002-2589(2014)30-0103-02

学术二字在今人语汇中已为一个名词,而在古代二者却是各有所指。朱维铮先生指出早在汉代,人们已经看到儒术与经学的区别,儒家取代法家和黄老成为主导政治思想也主要是靠“术”,而不是“学”,二者的差别在于“术重实用,学贵探索”,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成分的经学向来就讲求“通经致用”和“学随术变”<sup>[1]10-11</sup>。朱先生对经学这一特质的考察是相当有见地的,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化整体的特质。不过,朱先生在经学史中所说的“术”,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君王“南面之术”的色彩,故而有了后来乾嘉学者区分“学”与“政”的努力,而其所说的“政”也与“术”有着重要的渊源,故而在晚清学者的话语中也一度继承了“术重实用”的特点<sup>[2]11-12</sup>。

这里所讨论的“学”与“术”,着眼于文化整体,既不是经学,也不是君王南面之术,而正如蔡元培所说:“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,学为学理,术为专用”<sup>[3]42</sup>,区别了二者的不同,而“学”与“术”又是难以割裂的,梁启超认为“学也者,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;术也者,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”,而“学者术之体,术者学之用”<sup>[4]271-273</sup>,严复将二者定义为“盖学与术异,学者考自然之理,立必然之例。术者据既知之理,求可成之功。学主知,术主行”<sup>[5]885</sup>,立意大致一样,都是强调学理与致用的区别和联系。

如果以学、术之别来看待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,那么梁启超所说的“器物—政制—文化”这一递进模式,其实就是学习的内容由“术”向“学”递进的模式,在以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期间,先进的中国人基本上都遵循的所谓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毋宁说是“中学为体,西术为用”。

罗志田先生已经指出,近代中国人提出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其目的和重心都在“西学为用”上,而“中学为体”的问题其实也是产生于“西学为用”的时代需要<sup>[6]19</sup>。而在实践上迈出中国学习西方第一步的洋务派官僚也正是固守“中体西用”的信条,其关注者主要在于“用”,而“用”的范围主要包括整个经济领域,其中的变化又主要体现在对科学和商品经济的认识上<sup>[7]72</sup>。但是,洋务派官僚心中的“西用”其实主要就是“西术”,李鸿章深为西方科技成果所折服,说:“轮船电报之速,瞬息千里;军器机事之精,工力百倍;炮弹所到,无坚不摧;水陆关隘,不足限制;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”<sup>[8]825</sup>,故对于中国而言,“机器制造一事,为今日御侮之资,自强之本”<sup>[8]321</sup>,认为“中国但有开花大炮、轮船两样,西人即可敛手”<sup>[8]2418</sup>,据此,李鸿章似乎有科学观念,但是若仔细考察,不难发现,李氏所言均为科学转化而成之技术成果,而非科学本身,其所重视者为“西术”,而非“西学”,重实用,而轻探索,着眼于技术,而非理论。再从当时的新式教育来看,其科目也是“分为格致、测算、舆图、火轮、机器、兵法、炮法、化学、电气学数门”<sup>[8]825</sup>,所培养的是西方技术的实用人才,而非科学理论的研究人才,其所要针对的仍然是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。张之洞《劝学篇》有“西艺非要,西政为要”的论述,似有区分“学”、“术”之意,但细审其“西政”所指,则仍主要在于管理一类,并不同于今之所谓“政治学”<sup>[9]12</sup>,虽与“西艺”有别,但仍然属于“术”的范畴。

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技术成果的同时,并没有树立科学观念,进行科学理论的学习与探索,在“学”的层面上,仍然固守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,冯桂芬在其《校邠庐抗议》中提出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,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<sup>[9]57</sup>,大

收稿日期 2014-08-01

作者简介:任卫东(1989-),男,四川绵阳人,硕士研究生,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。

概为“中体西用”最早的表述,冯氏关注西方者即在于“富强之术”,在“术”而非“学”,其“学”在于恪守“中国之伦常名教”。郑观应从道器、本末之别出发,认为“善学者,必先明本末,更明大本末,而后可言西学”,而中西之别则在于“中学其体也,西学其末也。主以中学,辅以西学,知其缓急,审其变通,操纵刚柔,洞达政体”<sup>[10]112</sup>。张之洞《劝学篇》亦明确主张“以忠义号召天下之心,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,乃天经地义之道,古今中外不易之理”<sup>[11]40</sup>。

在洋务运动期间,先进知识群体除了认识到西方科技成果的威力之外,也隐约认识到西方政治体制的优越,而在西方政制之中,最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议院,故在这一阶段已有人提出开议院的主张。

王韬看到了中西差距不仅在于器物,亦在政制。他认为西方“能横行于天下者,在乎上下一心,君民共治”,而中国为其所败则“由上下之交不通,君民之分不亲,一人秉权于上,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”<sup>[12]289</sup>。

同时他还比较了“君主”、“民主”和“军民共主”三种政体,认为在议院制度下,“君民共治,上下相通,民隐得以上达,君惠亦得以下逮”<sup>[13]19</sup>。

王氏虽看到了西方政制的优越,但其心中议院的功能仅仅通上下之情而已。

比之于王韬,郑观应看到了议院限制权力的功能和设计。他说:

君主者权偏于上,民主者权偏于下,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。凡事虽由上下议院定,仍奏其君裁夺。君谓然,即签名准行;君谓否,则发下再议。其立法之善,思虑之密,要皆由于上下相权,轻重得平,乃克臻此<sup>[10]26</sup>。

虽提出限制权力的问题,但其权力运行的过程仍然以君主为终端,最终的决策仍然操于君主之手。

但是,比起这些枝节性的问题而言,王、郑二氏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并未提出制定宪法的主张,对于西方政制而言,立宪恰为其本,而议院不过其末,只是施行宪政的一个手段。如此看来,则王、郑二氏关于开议院的主张,所学习的仍是“西术”,而非“西学”。

由此诸方面可以看出,洋务时期的官僚、先进知识群体所学习、所模仿的都只是西学的表现形式而已,并未涉及西学的本质和根源。其向西方学习的动机是源于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这一屈辱的事实,对于中西强弱的根本并没有深刻的认识,其所学内容也是相当功利、实用性的技术成果,以富国强兵为其目标,而并未看到这些先进技术后面还有更为根本的科学理论为其支撑。

总之,洋务运动期间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只知致用,而不知还有学理探索,因此这个过程其实就是“学”与“术”分离的一个过程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“学”是特指西学,因为当时还有“中学为体”。

但是,随着向西方学习的逐渐深入,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这种不足,认为“中学为体、西术为用”并不能致中国于富强,学习西方的根本在于“西学”,而非“西术”,同

时也意识到中学与西学的分歧并不能以“中体西用”的方式加以解决。严复说:“中学有中学之体用,西学有西学之体用,分之则并立,合之则两亡”<sup>[5]558-559</sup>。梁启超也认为:“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,无益之学也;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,欺世误人之术也”<sup>[4]272</sup>,都代表了世纪之交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一步深入,也就是“学”与“术”要为一体而不能分割。这样,“中体西用”的模式自然就不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选择,而在西强中弱的时代背景下,要“学”、“术”一体,那么走向全盘西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于是,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,中国人就从“西学为用”(更确切地说,其实是“西术为用”)走上了一条“中学不能为体”的道路<sup>[7]7-29</sup>。之后便有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,也就是梁启超“器物—政制—文化”模式的“文化”层面,这是一个文化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,以“学”、“术”之别视之,则之前的器物、政制之变都只是“术”之变,而文化之变就是“学”之变。

但是,新文化运动以暴风骤雨的气势骂倒了中国传统文化,即“中学”,但却未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体系,“中学”虽然已经不能为体,但也并没有实现西学为体,中国的核心文化层出现了真空,而这种核心文化层的真空现象至今没有改变。

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学习为例,梁启超已经看到理论与技术的区别:“观察此事实,以证明水之有浮力,此物理学也;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,则航海术也。研究人体之组织,辨别各器官之机能,此生理学也;应用此真理以治疗疾病,则医术也。”<sup>[4]271</sup>。梁氏已认识到学理与技术二者的区别和联系。但是,我们的理论科学教育并没有遵循这个认识和应用的循环模式,而是一味地传授理论,死记公式,直接套用,所谓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其实就反映了这种功利的学习方式,这样理论也就成了成果,学习作为理论科学的“学”其实就成了学习作为技术成果的“术”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朱维铮.中国经学史十讲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2.
- [2]罗志田.中国近代史学十论[M].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3]蔡元培.蔡元培全集(第4卷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- [4]梁启超.学与术[M]//夏晓红.点校.清代学术概论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.
- [5]严复.严复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6]罗志田.再造文明的尝试:胡适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.
- [7]陈廷湘,李慧宇.中国新文化思想史纲[M].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1995.
- [8]李鸿章.李鸿章全集[M].海口:海南出版社,1997.
- [9]冯桂芬.校邠庐抗议[M]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2.
- [10]郑观应.盛世危言[M].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2.
- [11]张之洞.劝学篇[M]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
- [12]王韬.弢园尺牘[M].台北:文海出版社,1983.
- [13]王韬.弢园文录外编[M]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2.

(责任编辑 李鹏飞)